龙云公馆的强音

龙云有三处公馆，而且它们都与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。前面已经说到，威远街的公馆划出一半借给了西南联大，西郊灵源别墅则是龙绳祖履行入盟宣誓之处。龙云还有一处私宅，即大东门外临江里172号的震庄公馆，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友发出时代强音的场所。

震庄公馆位于今天昆明东风广场北面盘龙江畔，现已改为昆明市震庄迎宾馆。它有内外两院，外院有7栋中式小楼及水上餐厅、亭榭，内院则是一组保持着当年法式风貌的建筑，核心建筑是曾经做过德国驻昆明领事馆的乾楼。1919年中德两国断交，领事馆关闭，后来龙云修建私家花园，把这里买了下来。1946年4月，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了欢送母校师长，筹划举行话别会，可在昆校友很多，到哪儿找这么大的地方呢？考虑到震庄公馆地方宽大，地点适合，尤其是龙云的大儿媳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生，于是话别会会场就选在了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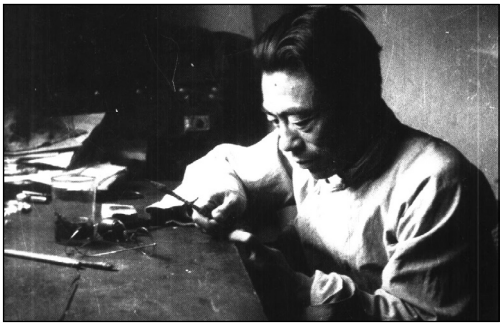
4月14日是星期天，下午1时，西南联大60多位教授和200多学生来到震庄公馆，举行了离昆前的最后一次校友大聚会。在不少联大校友回忆中，都写到了这次话别会，这倒不仅是会上备有茶点、组织了游艺，也不仅是联大剧艺社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，和师生互相赠言、畅述感情，而是由于大家严肃地回顾了学校的八年历程，利用这个场合批评教育制度，抨击现实政治，甚至公开指名道姓大骂蒋介石。

龙云公馆回响的这些声音，为龙云与西南联大的关系，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（本文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）

联大教授的“第二职业”

○徐　强



西南联大时期挂牌治印的闻一多

家无升斗，欲吃卯粮不能；邻亦箪瓢，叹呼庚之何益？典尽春衣，非关独酌；瘦松腰带，不是相思！食肉敢云可鄙，其如尘甑愁人；乞墦岂曰堪羞，争奈儒冠误我！

这段谐谑意味十足的骈文，出自语言学家王力1944年的小品文《领薪水》。说的是哪一群人的惨状？昆明的“公教人员”。联大教员正是战时“公教人员”的典型。王力身列其中，感同身受，短短几句，教授群体生活困顿、斯文扫地之窘态跃然纸上。其中典实，几乎句句都可以在昆明教授们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注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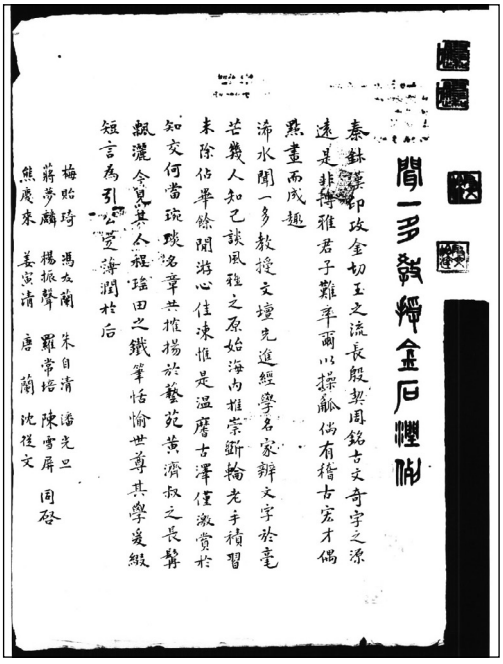
据联大经济学教授杨西孟统计，昆明是抗战期中全国物价的最高峰，而薪津实值是后方的最低谷。在昆教授多有家累，这一精英群体沦为月光族、欠债族。面对残酷现实，他们只能“开源节流”，窘迫中就无法再顾及“儒冠”的“面子”，纷纷放下身段，从事“第二职业”。综观联大、云大教授们的副业，可谓多业并举、百家经营。

较为体面的兼职是立足“公知”岗位，延伸服务领域，以获取额外收入。文科教授多营此类副业。典型工种包括：

为报刊撰稿，可称“摇笔杆子”。战时很多文教机构云集昆明，舆论需求旺盛，催生了形形色色的“小报（刊）”。联大、云大的教授成为首选作者阵营。一批教授身份的专栏作家应运而生。王赣愚、费孝通、芮沐、沈从文……都厕身其中，成果可观。语言学家王力客串小品文，在《生活导报》等开设多个专栏，聚焦战时世相，摭拾生活琐屑，随意挥洒，幽默俏皮。他毫不避讳“为稻粱谋”的写作动机：“我开始写小品的时候，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……”，却不意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独特一家。至于刘文典写谀墓祝寿文，罗常培、郑天挺、游国恩等受聘修大理县志，有些教授在电影院任英文翻译等，都可视作“摇笔杆子”的变体。

兼职中学教师，是为“动嘴皮子”。以国文学科教授来说，闻一多曾任教昆华中学，朱自清任教五华中学，游国恩任教云大附中，王力任粤秀中学校长，萧涤非任教昆华、天祥中学。大学教授教中学，直接后果有两个：一是这些受教的中学生有福了，能够亲承一流学者之謦欬，这是承平时期一般学生难得的机会。二是促使教授们思考中学国文问题，拉近了纯学术与基础教育的距离，客观上提升了国文学科的教研水平。朱自清、王力等成为现代国文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，无疑和他们的中学教学实践是分不开的。

闻一多操刀篆刻，可谓“卖手腕子”。闻一多早年留学芝加哥大学学的原是舞台美术，科班的造型艺术出身，又兼多年研讨上古文化，于文字之学素养深厚，干这一行自是发挥专长，在联大教授中也是独一份。他先是摆摊揽活，后公开悬例，生意兴隆，甚至常常积压“订单”。因常半夜操刀，手指都为之变形。由浦江清执笔、十二名教授联名的《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》，化俗务为雅事，早已成为文坛佳话。闻一



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

多全集的美术卷收有五百余方印章，是现代金石艺术的珍品，而闻一多的这段篆刻经历，也不啻为现代篆刻史上的重要一页。

第二大类是进入传统的“货殖”诸业。用今天的产业分类观点，第一、二、三产业都有人涉足。

第一产业：种植和养殖。种养未必和专业有关，但需要一定条件，所以为者不多。汪曾祺在小说《日规》中写了一个“卖花教授”高崇礼的故事。其原型是化工系教授高崇熙。高崇熙留学美国期间曾在花圃打工，学会了种花，尤其善种唐菖蒲（剑兰）。他带回来的种子特别适应昆明气候，他在联大北院种了一大片，十分漂亮，但不许人随便采摘，因为他每天要剪下鲜花由夫人到近日楼花市摆摊出售，颇为旺销。这算种植业的成功人士。相对来说物理学家吴大猷就不那么幸运。他的夫人阮冠世体弱多病，住院、用药花销甚巨。1943 年春，吴大猷在岗头村养了两头猪，准备年底变卖掉贴补药费、营养费。后来夫人住院，期间吴大猷请得意门生黄昆看家。黄昆每天把猪赶进猪舍要费很大劲，后来因为阮冠世住院时间长，吴大猷乃回信叫他草草卖掉。糠料喂了不少，却没能捱到出栏期，做了笔赔本买卖。

第二产业：制造业。无非是一二人的小作坊，但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，行业准入条件最高。成功者如化工系教授谢明山和航空系教授王德荣合作，研制出一种优质墨水，取名“西曼”，一时成为昆明名牌产品。赵忠尧本是理论物理学家，但动手能力强，战前在清华就自己动手制作云雾室、盖革计数器等设备，一直怀有工业救国理想的他，曾用一台德国机器，联合叶企孙等友人集资创办了长城铅笔厂。昆明时期，赵忠尧的副业则是跨界到“化工界”——他在家自制肥皂，课余骑自行车载着去给客户送货，以此能勉强度日。

第三产业，即“下海”经商。此业无关专业、无需一技之长，门槛最低，几乎人人可为。《朱自清日记》1943 年 3 月 15 日记：“了一来谈及在龙泉镇开设小商店，并赠小孩棉被。”那么，王力是开过小商店，至少是有此设想，是确定无疑的了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云南大学门前卖过大碗茶，有的教授远走川贵做药材生意，都算开了教授下海的先河。

如果把典卖也算作经营的一种初级形式，那么这个队伍就庞大多了。最早上街摆摊的还是吴大猷，他因夫人患病花费亏空，卖掉了从香港、上海带来的衣物、用品。气象学家赵九章情急之下卖掉了祖传 600 多年的宝物——明代先人赵子长的五台山美景图。书籍是教授的饭碗和“生产资料”，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出手。法学家费青将珍藏外文书转让北大换钱治病，明史专家吴晗则将 16 箱专业藏书转让云大，为此大哭一场。同样因疾病缠身，化学家黄子卿卖完衣物又卖掉书籍，酷爱杜诗的他曾赋诗慨叹：“饭甑凝尘腹半虚，维摩病榻拥愁居。草堂诗好难驱疟，既典征裘又典书。”

杨西孟用经济学语言描述教授通过典卖方式维持生活的现象：他们“消耗早先的储蓄，典卖衣物及书籍，卖稿卖文，营养不足，衰弱，疾病，儿女夭亡……换句话说，经常性的收入不足，只有消耗资本，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了。”历史学家雷海宗因贫血曾昏倒路上，生物系吴蕴珍、社会学系陶云逵贫病中坚持田野工

作，英年早逝，都是杨西孟这一结论的例证。

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不管怎么说，国难方殷，教授们靠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副业经营，一能存活下来，二能坚持教学研究，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，书写下一章“穷且益坚”的知识分子生活史。

（转自《西南联大讲坛》第16期）

入党前后

○沙　叶（1945入学联大）

沙叶学长近照

我是怎样进西南联大的

我在学校时叫周桂棠，内蒙古赤峰人，1924年生。1933年日寇侵占家乡后，即受到“去中国化”的教育。不知有中国，更不知祖国在抗战。我小学同学郭荫棠（何日红）在北平育英中学上学，对我讲了祖国在抗战，激起我热爱祖国、向往祖国的热情。他还无私地资助我旅费，使我能逃到大后方。

1942年经教育部分配，在四川白沙国立十七中上高中。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，尤其是知识青年。幸运的是我有机会读到马列主义书籍和《新华日报》，因而向往共产党，并一心想参加革命。高中毕业后，虽然想去延安，但无人介绍，加上离开学校没有了公费，生活就成了问题。幸蒙同乡、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教务长毛韶青先生留我在他家复习功课，才考入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外语系读书。生活有了很大改善，领导和老师都很好，我很满意。不料1944年冬，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，一直打到贵州独山，整个大后方受到极大震动。国民党提出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口号，动员青年参军，《新华日报》则号召有志青年去农村或去延安参加革命。于是我决定离开浙大，于1945年重新投考被称为“民主堡垒”的西南联大，目的就是找共产党。不料初试合格而复试落第，被录取到联大先修班。先修班相当于预科，复习高中课程，结业时考试合格者免试升入本科。幸运的是入学后不久即加入了由程法毅（陈英）、田振邦（林华轩）、潘梁、陈鲁生、尚嘉齐、彭珮云、孙蔼芬（孙梁）